

来自越南的理发师

在加州读书，不太需要发愁找不到理发店。我时常去学校旁边的一家，但能不能舒心地理个发却全靠运气。

理发时的心情与发型无关。和我同系的好友石雁室君，经常吐槽我发型四年如一日，好像是随时准备着照伟人标准像；唯一的变化是发际线逐渐后移，脑门慢慢凸出且闪亮起来，而这也使我长得越来越像某位伟人了。每次他胆敢对我的头发语出不敬，我就写一篇小说或者小品诅咒他。久而久之，连他也不敢说三道四了。因此我的心情完全取决于理发师的聊天风格。

如果遇到那位年长的大叔，便是极幸运的。大叔和其他店员讲广东话，对顾客则说话极少。他记得我要剪的发式，上来一句废话没有，给我披上一张曾经是白色的棉布，就开始剪起来。只十几分钟，一切完毕，拿镜子让我看一眼，我付了钱出门。一路无言，皆大欢喜。

倘若运气稍差一些，便会摊上一位小哥。这个小哥广东话和英文都讲得流畅，最近在学普通话；因此他每看到一位疑似的“满大人”，就要凑上来练练他的mandarin。文法是通畅的，发音也标准，错在他的话题选得不好。“你们最近非常忙吧？”“读博士怕不要学成书呆子了！”“暑假要不要带女朋友出去玩？”“天哪你居然没有女朋友！”“我准备过几天和我的女朋友去趟优胜美地~”几句话下来，我深深地恨上了他读的那本中文教材的作者。哪怕他像Tony老师一样给我推销几张会员卡，我都会稍微舒心些。

然而如果和那位阿姨相比，大叔和小哥则无足道哉。阿姨慈眉善目，动作轻手轻脚（因此非常慢），并且与小哥一样健谈。不同之处在于她不说普通话，而说一种支离破碎的英语，配合上我难以恭维的听力，对话就像朝核谈判一样举步维艰。而阿姨是一个有毅力的人，一定会坚持向我表达清楚，最近店铺的房租又上涨了五十刀，或者今年的国庆日烟花不如去年好看。一次我刚刚和石雁室一起做完通宵实验，来理发时困得打跌，而她喋喋不休向我宣传湾区的房价一定会继续大涨。我一时烦躁，请她安静一点。她连忙道歉，然后继续大声地向旁边理发的同学宣传，湾区的房价一定会继续大涨。

但这又有什么办法，世上总有种种不遂人愿之事。这三位亚裔理发师，一位说广东话，一位说普通话，还有一位说英语，日复一日地理着发，仿佛时间已经停滞。或许他们的生活也不算平顺，因为理发店里不显眼的角落里供着一座塑像，看不清是观音还是妈祖。

前几天晚上，理发店关门前十分钟，我急匆匆地赶来。店里已经没有顾客，只有那位阿姨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。见到我她兴奋起来，一边忙乱着给我披上那张曾经是白色的、满是碎头发的棉布，一边开始科普起来吃日本料理的危害。考虑到我是唯一的客人，她恐怕要慢悠悠地剪个半小时，我决定以我同样破碎的英语主动出击，把尬聊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“您是哪里人呀？”

“三文鱼如果是生着吃，是会有寄生虫的。”

“我是问，您是哪里人呀？”

“所以，一定要做熟了。最好是煮十分钟。”

“请问您是哪里人？是广东人吗？”

阿姨终于意识到我在问她。她停下来，开始想。

“我家里是广东人。我是在越南出生的。西贡，西贡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了，越南最大的城市。”我忍住没有说“那里现在叫胡志明市”，主要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用英文说“胡志明”。

“我们家原来在西贡有一座大宅子。我们开了许多绸缎铺子，在乡下还有田地。后来打了许多仗，但我们依然很富裕。我们有一座九层楼的饭店，在露天阳台上可以看到西贡的全景。主要招待中国人，也有法国人，越南人很少。每到晚上，阳台上就请来乐队，吹吹打打。那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情了。”

我越听越稀奇，这说的简直像是杜拉斯《情人》里面的情景。我很好奇她是不是认识杜拉斯的那位瘦削而脆弱的中国男友。但我忍住了没问；我知道就算花十分钟，我也没办法和她说明白谁是杜拉斯。

“我在品湖街上的福建中学读书，中学的边上有一座‘二府庙’，是泉州人和漳州人一起建的。拐一个弯到庙堂街，迎头就能看到一个大银器店，叫做‘泰镇康’，那就是我们家开的。

“之前的战争都没有什么，但最后一次战争开始之后，周围的越南人都像疯了一样。我们的雇工突然开始大声骂我们，还把大门打开，外面冲进来许多人，拿石头把所有窗户都砸烂了。我的奶妈也是越南人，但她拉着我跑到煤房里，把门反锁了，叫我不要出声。外面一直是叫嚷撕扯和哭喊。还有小孩子的尖叫，女人求饶的声音。有一次有人使劲摇煤房的门，又踹了几脚。门还是没开，他骂了一句然后走了。

“那天，我的小叔被打成了重伤。我们报警，警察说管不着。晚上全家人商议，父亲说应该准备离开了。但是要去哪里呢？没有去中国的船，并且在广东老家也没有认识的亲戚了。

“第二天父亲去银行想把存款提出来，结果发现华人的银行账户全都被冻结了。父亲回家说，必须得走，明天就出发。我们连夜收拾东西，只带金银和贵重的首饰。母亲坚持要把家里的妈祖塑像放进包裹里，父亲想了想，也没说什么。

“我们差不多把东西收拾齐整，这时听到一声巨响。

“大门被撞开了，许多人拿着火把冲进来，开始点火，泼油，烧我们的房子。母亲大喊，‘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杀了？’然后就被推倒在地。哥哥想从侧门冲出去，一群人捉住了他开始打。

“父亲拿起一个小包裹，就是那个放了妈祖像的包裹，跟我说：‘赶紧跑，从狗洞里钻出去！’我说：‘钻出去以后呢？’他说：‘去码头！’

“我拿着那个小包裹，使劲钻了出去，模糊看到街上许多凶恶的脸。我低着头在人群里疯跑。到了码头，一个认识的大叔叫住我，‘上船！’

“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岛上，在那里等了三个月。我的包裹在岛上被别的难民抢了，不过他们没有抢妈祖像。后来等到了美国的船，我就来了这里。”

我一直都没有说话。阿姨说到后来有点哽咽，但语调仍然很平静，比科普吃生鱼片的危害时还要平静。这时看到她停了下来，我胆怯地问了一句：

“那是什么时候？是1975年西贡被占领的时候？”

“不是，西贡被占领时我们交了一大笔钱，就没事了。我离开越南是在1979年。越南和中国在打仗，所以越南人恨我们。”

“对不起，让你想起了这些糟糕的回忆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这些都过去了。”阿姨拿起一小面镜子，“你看看，后面的头发长度怎么样？”

我戴上眼镜，打量了一下，“很好，谢谢你。”然后阿姨把碎头发吹掉，摘下那块原本是白色的棉布，我付了钱，道了谢，离开了。

后来我还常去这家理发店，阿姨仍然在说服大家“湾区房价会涨”，“最好别吃日料”。唯一的不同，是我现在很确信，理发店里不显眼的角落里供着的塑像，不是观音，而是妈祖。